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贫困与饥荒

〔印度〕阿马蒂亚·森 著



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贫困与饥荒

——论权利与剥夺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著

王宇 王文玉 译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贫困与饥荒/(印)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ISBN 7-100-03186-9

I. 贫… II. ①阿…②王…③王… III. 贫困-研究 IV. 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6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20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贫困与饥荒**  
——论权利与剥夺  
〔印度〕阿马蒂亚·森 著  
王宇 王文玉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3186-9/F·400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8 插页 4  
印数 5000 册

定价:19.00 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九辑。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6月

## **献给阿米亚·达斯哥布塔**

**——是他把我引入了经济学的殿堂，并教我认识了经济的本质**

# 目 录

序言	1
第 1 章 贫困与权利	5
第 2 章 贫困的概念	16
第 3 章 贫困:识别与加总	35
第 4 章 饥饿与饥荒	53
第 5 章 权利方法	61
第 6 章 孟加拉大饥荒	70
第 7 章 埃塞俄比亚饥荒	110
第 8 章 萨赫勒地区的干旱与饥荒	141
第 9 章 孟加拉国饥荒	163
第 10 章 权利与贫困	188
附录 A 交换权利	203
附录 B 交换权利一个例证性模型	213
附录 C 贫困的度量	229
附录 D 饥荒死亡:一个案例	243
参考书目	271
主题索引	306
人名索引	309

## 序 言

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那些关于穷人的冗长啰唆的经院研究,那些使用《李尔王》中诸如“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等绘画般的描述,难免会使人感到厌烦。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的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认识、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目前,可供使用的贫穷识别方法有许多种(如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贫困等),不过,每一种方法中都还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要从整体上描绘贫困,还必须超越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因为,要在贫困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贫困的整体画面,“加总”问题将无法回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在近期关于饥饿现象原因的研究中,贫困的起因具有特殊重要性。



这本专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第1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分析。之所以在详细论述贫穷概念之前就进行这一分析,是因为“权利方法”是这本著作的核心。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度量问题。第4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第5章分析“权利方法”。随后几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第6章)、1973至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第7章)、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第8章)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第9章);第10章是关于“权利方法”的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系的联系。

本书有四个附录。附录A给出了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换权利的公式化分析。附录B借助于一些模型说明了“交换权利失败”(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在饥荒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附录C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详细阐明了已经得到应用和已经提出的各种度量方法。最后,附录D以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为例,分析了饥荒死亡人口的分布问题。

本书原本是为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计划(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ILO)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耐心,因为本书的完成比我原来的设想要迟得多。我也衷心感谢费利克斯·波克特(Felix Paukert)等人与我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计划的有益讨论。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和乔斯莱恩·肯奇(Jocelyn Kynch)对本书初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良多。很多学者都给我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他们是:莫胡狄恩·阿拉姆基尔(Mohuddin Alam-

gir)、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阿塞特·布赫塔克基亚(Asit Bhattacharya)、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迪盘卡·查第尔基(Dipankar Chatterjee)、普拉米特·肖德赫利(Pramit Chaudhuri)、阿米亚·达斯哥普塔(Amiya Dasgupta)、梅纳德·德塞(Meghnad Desai)、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马戴恩古普尔·古什(Madan-gopal Ghosh)、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泰仑斯·戈曼(Terence Gorman)、凯斯·戈利芬(Keith Griffin)、卡尔·哈密尔顿(Carl Hamilton)、鲁戈·哈弋(Roger Hay)、朱利斯·霍尔特(Julius Holt)、雷弗·约翰森(Leif Johansen)、J. 克里西纳莫第(J. Krishnamurti)、穆库·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苏奇·佩恩(Suzy Paine)、戴比达斯·雷(Debidas Ray)、戴布拉·雷(Debraj Ray)、萨米尔·雷(Samir Ray)、塔班·雷坎德胡利(Tapan Raychaudhuri)、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乔恩·罗宾逊(Joan Robinson)、苏曼·萨卡(Suman Sarkar)、约翰·希曼(John Seaman)、里翰·索布罕(Rehan Sobhan)、K. 苏德拉姆(K. Sundaram)、加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和亨利·万(Henry Wan)等。

本书中还引用了我早期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73、1976)、《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 1976、1977)、《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6)、《剑桥经济学月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月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经济学文献月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9)、《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 1980)

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附录 A 到附录 C,都使用了一些数学概念和符号,但是,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公式化的。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不过、即使不参阅附录,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包括案例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由于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将尽可能使其通俗一些。可以不谦虚地说,在这本专题著作中,我所作出的分析是相当有实际意义的。

阿马蒂亚·森

# 第 1 章 贫困与权利

## 1.1 权利与所有权

1

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原因,但却只是很多可能的原因之一。饥饿与食物供给之间是否有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需要用事实来进行说明。

关于食物供给的陈述(statement about food supply)是指有关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自身的事情,关于饥饿的陈述(statement about starvation)则是指人与这种商品(或一组商品)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我们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因此,要说明饥饿现象,就必须深入研究所有权的结构。

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entitlement relation)之一。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

---

<sup>①</sup> 商品以及人与商品的关系之间的区别是许多经济理论的核心。实际国民收入评价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从传统国民收入评价方法向更加重视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方法论转变。见阿马蒂亚·森(1976b, 1979a)。

112208

以分析。<sup>①</sup> 这一方法既可以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分析,也可以更具体地应用于饥荒分析。

把一个权利关系运用于所有权,也就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建立一个所有权集合与另一个所有权集合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递推关系(recursive relation),并且,建立联系的过程是可以被重复的。设想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我拥有一片面包。人们为什么承认我对这片面包的所有权呢?因为它是我用我的钱买来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对这些钱的所有权呢?因为这些钱是我出售我所拥有的一把竹雨伞换来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对这把雨伞的所有权呢?因为这把雨伞是我用自己的劳动和我所拥有的土地里长出的竹子制成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呢? 2 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父亲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呢?如此等等。这一权利关系链中的每一环节都“合法地”把一个所有权集合联系到另一个所有权集合,或者联系到一项更基本的权利,即享有个人劳动成果的权利。<sup>②</sup>

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所公认的典型的权利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trade-based entitlement):一个人

---

<sup>①</sup> 饥饿分析的“权利方法”是阿马蒂亚·森(1976c、1977b)提出来的。这一方法在本书第5章和附录A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第6章至第9章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应用。

<sup>②</sup> 这里,权利关系的解释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不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相反,罗伯特·诺兹克(1974)所做出的正义的“权利理论”这一著名研究则是规定性的,他在规范的意义上研究了私人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因此,这两种理论的意义是不同的,决不能将其混淆。

有权拥有通过自愿交易所得到的东西(在多边贸易中,存在一个由自愿参与者所构成的集合);

(2) 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production-based entitlement):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

(3) 自己劳动的权利(own-labour entitlement):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有权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

(4) 继承和转移权利(inheritance and transfer entitlement):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必须是合法的,而且,这种赠予可能要等到赠予者去世后才能生效(如果他是这样指定的话)。

3

这些都是或多或少具有直接性的权利关系,而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其他更为复杂的权利关系。例如,一个人可能有权享有某些财产的成果而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交换;或者,按照一个社会所公认的亲属关系,一个人有权继承其病危亲属的财产,当然,这位亲属必须没有把这些财产遗赠给别的任何人;或者,一个人可以有权拥有自己所发现的且无人认领的东西。市场权利甚至可以受到配给制度(rationing system)或票证制度(coupon system)的补充,这种情况就曾在英国那样的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过。<sup>①</sup>

---

<sup>①</sup> “配给制度”或“票证制度”有可能与价格“控制”结合起来使用。如果“配给制度”不与价格“控制”结合,则会造成“黑市”(‘black market’)泛滥。关于黑市价格的详细分析可参阅达斯哥普塔(Dasgupta, 1950)。

所有制关系的范围会因为经济体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可能不允许“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从而使“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失败。但是,那些仅仅涉及到自己的劳动、一些简单的工具和原材料的则属例外。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则不仅允许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而且这是它的主要基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样——不允许像奴隶经济那样对人身的<sub>所有</sub>。社会主义经济会限制一个人为了生产目的而雇用另一个人,即限制为了生产目的而进行的私人劳动力贸易。资本主义经济则不会做出这样的限制,但有可能对长期的劳动力义务契约加以限制。在一些封建农奴社会和殖民地中,这样的契约则是非常常见的。

## 1.2 交换权利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

“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它为每一个所有权组合指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这一关系——缩写为“E-映射”(E-mapping)——界定了对应于每一种所有权情况,一个人所拥有的机会。如果一个人的交换权利集合中没有包含有足够食物的可行商品组合,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面临饥饿的威胁。给定E-映射,在不存在非权利转移(例如,赈济)

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识别出那些必定导致饥饿的所有权组合——我将其称之为饥饿集合。E-映射、饥饿集合等有关概念将在第5章中做详细论述,并在附录A中进行公式化分析。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基本概念。

在给定一个人的所有权组合(包括其劳动力)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人交换权利的因素有:

(1) 他是否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可能的话,时间有多长,以及工资是多少;

(2) 他出售自己的非劳动所得资产能够得到多少收入,购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需要花费多少钱;

(3) 用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可以购买和管理的资源(或资源提供的服务)能够生产什么;

(4) 购买资源(或资源提供的服务)的成本是多少,他能够出售产品的价值是多少;

(5) 他有权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及他必须缴纳的税金等。

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流权利映射。一般来说,食物供给的减少,会通过食物价格上涨,对一个人交换权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使他面临饥饿的威胁。所以,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假设一个社会中的食物供给总量不变,一部分人因为变得更富有而购买更多食物,造成食物价格



上涨,结果就引起另一部分人的交换权利恶化;或者,经济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其交换权利恶化;与之相类似,一个人货币工资的增加可能落后于物价的上升;或者他从事生产所必须的资源价格相对上升了,也会对其交换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关于交换权利的不利影响就像食物供给总量与人口总量一样是相关的。

### 1.3 生产方式

很自然,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换权利还取决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该经济中的生产方式。他所拥有的东西会随着他所在的那一阶层的变化而变化。即使 E-映射完全不变,实际交换权利也会随其所有权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即使所有权状况相同,交换权利还依赖于一个人的经济前途,而其经济前途又依赖于生产方式,以及就生产关系而言的他的社会地位。<sup>①</sup> 例如,一个农民与一个无土地的劳动者在所有权方面就存在着差别(因为前者有土地,而后者没有土地)。无土地的收益分成佃农(landless share-cropper)与无土地的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在所有权方面,而在于他们使用他们所惟一拥有的资源(劳动力)的不同方式。无土地的劳动者通过受雇于别人换得一份货币工资;而收益分成佃农则通过种植作物拥有一部分产品。

---

<sup>①</sup> 生产方式的经典论述及其对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可参见卡尔·马克思(1857—1858、1867)。

这一差别不仅造成二者的报酬不同(报酬的差别可能很大,也可能不大),更重要的是,在灾难发生时,这一差别将造成截然不同的交换权利。例如,假设暴风雨毁坏了农田中的庄稼,造成收获庄稼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导致一些劳动者被解雇,由此会完全摧毁这些人的交换权利。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分成佃农则只是减少了劳动投入,交换权利有所降低,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完全失去工作,一无所获。

如果产品是粮食,比如水稻或小麦,收益分成佃农所得到报酬是可以直接食用的粮食,不需要通过变幻莫测的市场。相反,接受货币工资的农业工人则不得不依赖于其货币工资的交换权利。饥荒往往伴随着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化——尤其是食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因此,当饥荒发生时,收益分成佃农往往要比农业工人更具有相对优势,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然而,与取得固定工资的工业工人相比,收益分成佃农却面临较大的生产风险,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分析(例如,见斯蒂格利茨,1974)。但是,在食品价格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一份固定工资并不能保证什么(即使就业有保证);相反,就交换权利而言,一份食品却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条件。

类似地,当食品价格发生预料之外的变化时,服务业人员(如理发师或人力车夫)或出卖手工制品的人(如编织者或鞋匠)——像工资劳动者那样——往往比种植粮食的农民或收益分成佃农更容易遭受饥荒,甚至在后者的典型生活标准低于前者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因此,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其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本书的后面,在分析实际饥荒时,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更加具体的说明。

#### 1.4 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

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系统建立之后,失业者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老年人可以得到养老金,贫困人口则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贫困救济金”。社会保障系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它们是一个人交换权利的组成部分,其条件是这个人没有进行其他交换。例如,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了工资,即成为就业者,那么,这个人就无权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与此相类似,如果市场交换使一个人的收入超过了规定的贫困标准,那么他也没有权利接受救济。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的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是对于市场交换和生产过程的补充,这两种类型的机会结合起来决定了一个人的交换权利。

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系统尤为重要。世界上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因为就平均水平来说那里的人们是富有的。当人们能够找到工作并能按照适当的工资率挣钱时,他们的确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状况并不

能保持很久。他们可能会被解雇,或者为了寻找更满意的工作而辞职,也就是说,他们会失业。在失业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身无分文,在没有社会保障系统的情况下,他们资源禀赋的交换权利就不能为其提供充足的商品组合。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今天美国或英国的失业状况会使很多人挨饿,甚至有可能发展成饥荒。因此,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英国人的平均高收入,也不是美国人的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

类似地,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消灭了饥饿。这是先消灭饥饿,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一个典型。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entitlement system)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到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

## 1.5 粮食供给与饥饿

最近,粮食供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观点十分流行,不过,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性证据却不多见。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非洲的部分地区除外——粮食供给的增加已经相当于或者快于人口的增长。<sup>①</sup>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饥饿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这是因为,饥饿——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

---

<sup>①</sup> 见阿塞兹(1975),辛赫(1976b,1977),辛赫和乔丹·德拉贝克(1978),因特福切里斯(1979),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报》及其月报(如,vol. 3, No. 4, 1980, 第15-16页),也可参阅本书的第5章和第10章。

——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粮食供给(food availability)<sup>①</sup>的函数。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最严重的饥荒正是在人均粮食供给(food availability per head)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见第6章、第7章和第9章)。

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这一说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过,由此可以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决定食物分配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权利方法将引导我们思考所有制形式问题,以及——虽不十分明显,但的确很重要——影响交换权利映射的因素(见附录A、附录B,以及第5—10章)。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八分之一的人正在遭受饥饿,<sup>②</sup>那么这只是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到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

本著作中所使用的权利方法具有一般性,而且,我认为,在饥饿和贫困的分析中,这一方法也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说它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只关注食物相对于人口的比率是十分幼稚的,这一幼稚的方法在过去几

---

① 在本书中,“food availability”与“food supply”基本同义。本书作者几乎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一个细微的差别是,“food availability”表示实际存在的粮食数量,即粮食存量;而“food supply”则包含有价格因素。不过,二者在本书的绝大多数地方是可以互换的。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原义,译者在有细微差别的地方用英文注出。——译注

② 见阿塞兹(1975),第108和123页。

个世纪中一直起着混淆是非的作用,并且扭曲了以往的反饥荒政策。直到今天,它仍在严重困扰着人们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sup>①</sup>

---

<sup>①</sup> 见第6、7、9和10章。

## 第2章 贫困的概念

9

### 2.1 贫困概念的必要条件

霍尔丹<sup>①</sup>临终时在加尔各答写下了一首诗,叫作《关于癌症的一个笑话》(Cancer's a funny thing)<sup>②</sup>。然而,贫困却一点儿也不好笑。让我们分析以下关于贫困的观点:

决不能让人们贫困到被迫犯罪或危害社会的地步。按照这种贫困观,贫困不仅是穷人的不幸和苦难,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社会不安并增加了社会成本。之所以存在贫困问题,是因为低收入者会为高收入者带来麻烦。<sup>③</sup>

---

① J. B. S. 霍尔丹(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作出了新贡献,1957年移居印度,著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译注

② 《牛津20世纪英语诗歌集》(*Oxford Book of 20 Century English Verse*),拉金(P. Larkin)编辑,牛津出版社,1973,第271页。

③ 雷恩(1971),第46页。我要补充的是,雷恩教授在这里所描述的是如下有关贫困的三个“宽泛概念”之一:(1)“生存”,(2)“不平等”,(3)“外部性影响”(externality)。引文中的观点对应于“外部性影响”。

贫困概念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消费标准”(consumption norms)或“贫困线”(poverty line)也许能部分地完成这一任务：“穷人”是消费水平低于消费标准的人，或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但是，这一问题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贫困的概念是否(1) 只与穷人的利益有关，或者(2) 只与富人的利益有关，还是(3) 与穷人的利益和富人的利益都有关呢？

主张贫困概念只与富人的利益有关不免有些荒唐。我相信放弃第二种观点以及引文中的观点大概不会引起争议。至于第三种观点，由于它的广泛基础和不受限制而具有吸引力。毫无疑问，穷人的贫困的确会影响到富人的福利。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影响是否应该进入贫困的概念之中？或者说，贫困的概念是否应该包括贫困所有的可能后果？我认为，我们可以为第一种观点提供充分的论据。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明显只是穷人的特征而不是富人的特征。例如，假设所有穷人的实际收入减少且忍受的贫困增加，那么，无论这一变化是否会给富人带来不利影响（例如，无论富人是否会因为贫困现象恶化而感到不舒服），这种情况都会被定义为贫困增加。

把贫困概念建立在第一种观点之上，并不否认穷人自身的痛苦可能会取决于富人的状况；它只是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贫困的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重要问题。把贫困的概念转化为穷人的状况并不影响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从一个国家中穷人所忍受的痛苦的意义上去认识贫困的普遍存在,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整个国家的相对富裕程度。<sup>①</sup>当然,在关于贫困的研究中,对全体国民福利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当我们把一个国家定义为穷国时,也必然会联系到国民福利这一比较宽泛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内部穷人的贫困与一个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引起混乱。

即使我们已经“识别”出穷人,并认定贫困的概念应该只关注穷人的状况,那么,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穷人进行“加总”,因为它涉及到把对穷人的描述变成某种贫困的度量。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先计算穷人人数的比率,然后再把贫困定义为穷人人数的比率。<sup>11</sup>

穷人人数量度( head-count measure)——简记为  $H$  ——至少有两个严重缺陷。第一,度量  $H$  没有考虑到穷人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程度:在不影响富人收入的情况下,全体穷人收入的减少丝毫也不会改变对穷人的数量度量。第二,它对穷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敏感,尤其是,当收入从一个穷人向一个较富的人转移时,穷人的数量度量绝对不会增加。虽然,  $H$  是目前应用得最为广泛的贫困度量,但是,上述的两个缺陷决定了它不能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所以,隐含其中的贫困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

<sup>①</sup> 例如,斯特里登(Paul Streeten):《穷国有多穷? 为什么?》(*How Poor Are the Poor Countries and Why?*)。

在这一章中,我不准备对贫困的度量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些问题将放在后面两章以及附录 C 中研究。不过,在每种度量方法之后都有一个分析性概念,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有关贫困概念的一般理论。如果上述思路是正确的,那么一个令人满意的贫困概念必须包括两个不同的——但并非完全没有联系的——要素:(1)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识别”(identification)];(2)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总体映像(over-all image of poverty)的方法[“加总”(aggregation)]。在后面两章中,我们将完成这两项任务。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研究有可能被用于选择具体做法(“识别”和“加总”)的各种思想。本章剩下的篇幅将用来分析这些问题。

在有关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于贫困概念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最近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另外一些则缺少必要的批判性研究。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将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

## 2.2 生物学方法

在罗恩特里(Seebom Rowntree)(1901)关于发生在约克(York)<sup>①</sup>的贫困的著名研究中,他把贫困家庭定义为“处于基本贫困”(primary poverty)的家庭。一个家庭处于基本贫困是指,其“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sup>12</sup>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物学思想常常被用于

---

① 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城市。——译注

贫困线的定义,也并不是很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饥饿显然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近,生物学方法遭到了猛烈的攻击。<sup>①</sup> 它的应用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身体条件、气候条件和工作习惯会有很大差别。<sup>②</sup> 事实上,甚至对一个特定地区中的一个特定群体来说,要准确定义其最低营养标准(minimum nutritional requirements)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知道,人类曾经借助于极少的营养而生存下来,并且,随着饮食条件的改善,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事实上,在很多地区,随着物质富裕程度的不断增加,营养也在增加。由于饮食的不断改善,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身高一直都在增加。因此,要准确地确定最低营养标准线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定要确定一条最低营养标准线的话,那么,潜在的随意性就很难避免,并且,这种随意性会超出种群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第二,要把最低营养标准转换成最低食物量标准(minimum food requirements)取决于商品组合的选择。这一转换其实是一个最优化问题,即对给定的最低营养标准,求解满足这一最低营养标准的成本最小的商品组合,解出的商品组合就是最低食物量标准。求解这一最优化问题的过程并不困难,不过,这样计算出的食谱是否有意义却不十分清楚。它的确是低成本的,<sup>③</sup> 却可能是十分乏

---

① 见图恩森德(Townsend, 1971、1974)和雷恩(1971)。

② 见雷恩(1971)、图恩森德(1974)、苏克哈特米(Sukhatme, 1977、1978)和斯林尼瓦森(Srinivasan, 1977a、1979)。

③ 见施蒂格勒(Stigler)于1945所给出“生活必需品成本”估计。也可参阅拉加莱曼(Rajaraman, 1974)。

味的,并且,人们的饮食习惯也不是由这一成本最小化问题的求解来决定的。另外,获得特定的最低营养标准所需要的实际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人们的消费习惯。

第三,对于非食物类项目来说,要确定最低需要量也是十分困难的。通常,这—问题是借助于一个假设条件来解决的,即假设人们会用其总收入中的固定比例购买食物。基于这一假设,再结合最小食物支出就可以计算出最小总支出。但是,人们在食物上的支出不仅依赖于习惯和文化,而且还依赖于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和总量。不难发现,这一假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经验常常是不一致的。例如,贝弗里奇(Lord Beveridge)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估计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在英国人的收入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要比通常所假设的低很多(见图恩森德,1974,第17页)。

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会赞同雷恩(1971)的如下看法:“贫困的最低生活水平定义中的每一过程几乎都有缺陷”(第61页)。这样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在批判了生物学方法的每一过程之后,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简单地摒弃这一方法呢?<sup>①</sup>还是研究其中是否存在可供借鉴的东西呢?我认为,生物学方法中的确存在可供借鉴的东西。

---

<sup>①</sup> 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供选择的其它方法是什么。1971年,雷恩本人也曾指出:“其他概念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并加以发展”(第62页)。由于“生存”只是其三个宽泛的贫困概念之一,“外部性影响”和“不平等”的发展和完善工作就留给了我们。无论就贫困的原因来说,还是就贫困的衡量来说,不平等都与贫困有关。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三节中所说明的那样,不平等与贫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至于“外部性影响”,就穷人对非穷人的影响而言,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进行了批判性说明。

首先,虽然最低营养需求的确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概念,不过我们也没有特殊的理由苛求贫困概念自身必须是完全清晰的。事实上,在这两个概念中都隐藏着一定的含糊性,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两个概念的含糊程度,即按照通常的解释,在哪些方面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因此,结果不是营养标准是否含糊,而是这种含糊性是否必要。

第二,要考察一个人是否正在享有某种营养组合,我们不必看他是否具有获得这一营养组合所需要的收入水平,只需要简单地观察这个人现在的营养状况是否满足营养标准即可。甚至在贫穷的国家中,关于营养状况的直接信息也能够通过对消费组合进行抽样调查而收集到,并存在进行广泛分析的基础[见斯林尼瓦森和巴德罕(Bardhan), 1974, 尤其是查第尔基(Chatterjee)、萨克(Sarkar)、波尔(Paul)和帕尼卡(Panikar)等人的文章, 1975]。因此,在营养标准方法中,“识别贫困”根本不必要借助于收入这一媒介。

14 第三,如果我们一定要借助收入媒介的话,使用我们社会中流行的消费行为模式则可以大大简化从营养标准(或这类标准构成的一个集合)到“贫困线”收入(或一组“贫困线”收入)的转换。接近现实的消费行为和习惯的假设,将使我们能够估计出满足营养标准的“典型”收入水平(在第3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

第四,虽然营养不良只抓住了贫困概念的一个方面,但不可否认,营养不良是贫困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尤其重要。因此,在贫困的概念中,营养不良必然占据

中心地位。虽然对于如何确定其具体位置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是,最近出现的对这一方法的全盘否定则肯定是错误的。

### 2.3 不平等方法

贫困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这一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毕竟,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富人向穷人转移收入可以减轻贫困的程度。当识别穷人的贫困线标准不得不根据一个社会当时的生活标准来确定时,贫困就好像进一步表现为这个社会中最贫穷的一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

米勒(Miller)和罗比(Roby)曾经说明了他们支持贫困就是不平等这一观点的理由,他们的结论是:

从社会等级阶层的角度来考察贫困问题,可以使我們认识到,贫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不平等问题。在这一方法中,我们并不试图去测定具有伪科学准确性的贫困线。相反,我们观察一个社会中最富有的20%人口或10%人口,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别的性质及大小。我们所关心的是处于各等级最底层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差别的缩小。<sup>①</sup>

我们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理由来支持这一观点,但是,这并不能 15

---

<sup>①</sup> 米勒和罗比(1971,第143页)。也可参阅米勒、雷恩、罗比和クロス(Cross, 1967)。还可参阅威德波恩(Wedderburn, 1974)关于其他方法的论述。

否认,不平等与贫困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试图把贫困“当作一个不平等问题”来分析,或者以某种与此相近的方式来看待二者的关系,都是不恰当的。当然,不平等与贫困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只不过,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包括另一个。比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高收入阶层中的一个人向中等收入阶层中的一个人转移收入,肯定会减少不平等程度,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贫困的感受。与此相类似,收入普遍下降可能会使以某种指标衡量的不平等程度保持不变,但却会导致饥饿、营养不良以及人们贫困程度的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说贫困程度没有变化岂不荒唐?无视饥饿这样的信息不是对“伪科学精确性”的禁戒,而是对那些理解贫困的重要参数的忽视。总之,贫困并不意味着不平等,不平等也不意味着贫困。<sup>①</sup>

当然,从认识到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相互联系,到认识到即使在一个国家生产能力不提高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来减少贫困,是有一定距离的。认识到作为一个概念的贫困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可以使我们把贫困概念当做一个有意义的、有其自身复杂性的问题来看待。这样,不平等在贫困的一般存在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被纳入贫困概念之中了,从而无需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

---

<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不平等的方法有很多种,“高收入 20% 或 10% 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是其中之一。见阿特金森 (Atkinson, 1970)、阿马蒂亚·森 (1973a)、考尔姆 (Kolm, 1976a、1976b) 以及布莱克贝 (Blackorby) 和多纳尔森 (Donaldson, 1978、1980b)。另外,不平等不仅是收入分配问题,而且还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多方面的悬殊差别问题,正如卡尔·马克思 (1859、1867) 在生产关系意义上所作出的分析那样。

## 2.4 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概念已经被卓有成效地运用于贫困分析,<sup>①</sup> 在社会学文献中尤其如此。贫困(Being poor)与相对贫困(being deprived)是有联系的,尤其是对于人这种社会动物来说,贫困的概念更是相对的。但是,在相对贫困这一术语的一致性中,似乎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贫困感”(feeling of deprivation)与“贫困状况”(condition of deprivation)之间的区别。图恩森德认为“后者是一个更好的用法”。<sup>②</sup> 为了能够把相对贫困准则建立在具体的条件之上,我们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这样的准则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在客观意义上用“相对贫困”来描述人们的处境,即与另一些人相比,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欲望得到了较少的满足,如收入、舒适的职业或权利等。<sup>③</sup>

另一方面,“贫困状况”的选择不可能独立于“贫困感”。对物质目标的评价不可能不涉及到人们对这些评价对象的看法,即使“感觉”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在“属性”的选择中,它们也会隐含地发挥作用。图恩森德曾正确地分析了界定一个社会典型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他指出:“努力界定一个社会中流行的或公认的生活方

---

① 鲁西曼(Runciman,1966)和图恩森德(1974)给出了有关这一概念的不同观点。

② 图恩森德(1974),第25—26页。

③ 威德波恩(1974),第4页。



式,并发现是否存在……资源分配的某个分界线,在此界线之下的家庭就很难……享受这一典型生活方式所包含的生活习惯、日常活动和营养等”。<sup>①</sup> 然而,在决定被人们视为至关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时,我们还必须关注“贫困感”。实际上,我们也无法把“贫困状况”与“贫困感”完全割裂开来,要客观地判断“贫困状况”,就必须客观地理解“贫困感”。

第二,用于比较的“参照组”选择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作为比较参照的人的情况,这是我们在使用相对贫困概念 1 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当然,横向比较不可能独立于问题中的社会政治活动,<sup>②</sup> 这是因为,一个人关于贫困的感觉与这个人的预期、他对公平的看法以及他对谁有权享受什么的判断密切相关。

对于贫困的社会分析来说,这些与相对贫困这一宽泛概念有  
17 关的不同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贫困观——甚至包括它的所有变形——并不能真正成为贫困概念的惟一基础。例如,无论一个社会中收入分配的相对模式是什么,饥荒总会被认为是赤贫的表现。由此看来,在我们的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core of absolute deprivation),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可以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因此,相对贫困

---

① 图恩森德(1974),第 36 页。

② 例如,斯克思(Richard Scase, 1974)指出,瑞士工人所选择的参照组就比英国工人更为广泛,这一差别与两国工会运动和政治组织的差别不无联系。